

总 序

近二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成就,举世瞩目,在增强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取得了极大的效果。毋庸讳言,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负面的影响,例如耕地的缩减,植被的破坏,水土的流失,湖泊的淤浅,干旱区荒漠化、沙化的加速,以及城市化过程中,水污染和空气污染严重等等环境恶化问题,也十分突出。这些问题的出现,有的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一时难以避免的现象;有的是人们对自然界的无知,采取唐突的措施所造成的后果;有的则是当政者为单纯追求政绩,不计后果,盲目开发,引起的环境恶化。以上种种,都是人们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对自然界过度索取或无序干预后所引起,其实质是人地关系的不协调,而这种不协调又往往并非一代人所造成的,而是有其历史的继承性和延续性。

我们谈到人地关系时,所谓的人,并非自然人,而是社会人,不同时期的社会人,对自然环境的认识不一样,对生产技术的掌握不一样,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不一样;而我们所谓的自然环境,在历史上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即是同一地区的自然环境,经过长期人类活动的影响,随着历史的发展,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再进而言之,我国地域广大,人口众多,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地域差异十分明显。而这种差异的形成,又有着不同的历史背景,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因此,我们如果研究当今环境问题,或想在制定保护措施和政策上,有科学的根据,就有必要对我国环境变迁的历史背景作比较深入的了解,对我国环境变化和人类活动之间的互动关系有较深刻的研究,而这种研究又必需从区域研究入手。

本丛书的组织和撰写,就是希望能在在这方面尽力做些工作。但是,我国地域广大,要对我国全境作全面的研究,短时期内实在难以做到。所以,我们先选择若干比较典型的地区,对近五百年来(主要是明清以来)人地关系的复

杂过程作比较深入的研究,希望通过这些地区的研究,能够粗略地反映我国历史环境变迁的全貌。这就是本丛书编写的主旨。

淮河流域是我国南北自然的分界线,也是我国南北文化的过渡地带。黄河流域文化向南传播,长江流域文化向北传播,两种文化在淮河流域会合交融,呈现了绚丽多彩、浑成敦厚的文化景观。这里气候适中,土壤肥沃,水资源丰富,从秦汉以后直至唐宋,淮河流域长期是我国经济发达地区之一。农业生产在全国居重要地位,隋唐以来又是南北大运河必经之地,水运交通十分发达,人口集中,城镇林立,商品经济比较繁荣。北宋建都开封,皖北地区邻近京畿,其地位较前代更为重要。然而在 12 世纪 20 年代一次黄河人为决口,河道改由东南流,夺淮入海,直至 19 世纪中叶,黄河在河南兰阳铜瓦厢决口,改由山东入海,在长达 7 个世纪的时间内,淮河成为黄河的支流。由于黄河泥沙的淤积,淮河下游出口排水不畅,洪水季节壅塞成灾,洪灾以后又有旱灾,从而造成皖北地区成为水旱灾害频发区,明清以来尤甚。这一偶然黄河改道事件,竟一改淮河流域人民的命运,实始料所未及。近五百年来,皖北地区的人民深受水、旱、蝗灾轮番发生之苦,生活处于极端贫困的境地。在此期间,历代政府也并非无所作为,明清两代也曾对皖北灾害地区推行过一系列赈恤的荒政措施,以求社会的稳定。但赈灾的力度和效果又与当时的国家财政、吏治清明有关。因此,在明、清、民国三个时期的赈灾效果,往往是杯水车薪,难以使当地人民完全摆脱艰难的困境。而当地人民为了生存,不免采取一些非常手段,沿袭成俗,成了社会不稳定因素。例如青黄不接季节,外出讨乞,竟成当地人民世代相传的民风,其悲惨的命运,可以想见。《明至民国时期皖北地区灾害环境与社会应对研究》一书,即对五百年来皖北地区生存环境恶化和人们如何采取应对措施,作了十分细致的研究,直至今日,皖北地区仍然是我国灾害比较频发、经济比较落后、广大人民生活比较贫困的地区。历史的研究,能否给今天的发展有所启示?

太湖流域是宋代以后,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明清时期更为国家财政收入渊藪。物殷财阜,人才荟萃。这个地区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有其自身的特点:在自然方面,一是地处长江三角洲,水系发达,河湖港汊密布,水资源十分丰富,但又因东临海域,沿海一带地势高亢,故又是旱涝潮灾频发的地区:二是区内呈现了低地、山丘、冈身、湖荡、滨海沙地相间的复杂的地理景观,人

们为适应这样复杂的地理环境需要付出极大的劳动。在人文方面：一是人口密集，耕地紧张；二是产业多样化：水稻、蚕桑、植棉、茶业以及家庭手工业十分发达；三是商品经济繁荣，市镇林立；四是因社会经济发展而引起“乡绅”阶层的兴起及其在社会发展中产生的重要作用；五是历史发展形成的行政空间插花错壤与调整，是本区行政管理上的麻烦事。在自然和人文环境如此复杂的地区，却能在宋代以后的近千年时间里，始终保持全国经济领先的地位，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其中地方政府、士绅、民众三个层次的力量，在自然和人文复杂的环境下调整矛盾、取得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平衡，形成一个相对和谐的社会。其中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太湖平原的环境刻画与城乡变迁（1368—1912）》一书的作者为我们作了深入和细致的分析。

长江中游的两湖地区，无论从自然或人文环境而言，都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地区。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平原，位于长江中游，自地质时期以来即为沉降地，境内河流纵横、湖泊密布：湘、资、沅、澧四水汇集洞庭并与长江相通，汉江自西北向东南汇注长江，江汉湖群密集，构成“水乡泽国”之河湖水系网。长江干流自宜昌以下，曲流发育，河道振荡无定，沙洲林立，河汉港湾变化很大。因此，在历史时期，其开发的进程要晚于长江上游和长江下游。唐代以前，地广人稀。宋代以后，因北方人口的大量南移，明代开始江西人口的大量移入，低洼沮洳之地才得次第开发。在这个地区进行生产和生活的人们，为适应当地自然条件，需要付出极大的劳动。低洼沮洳之地，必得先筑堤垸才能耕种，围湖造田成为当地农耕地的特色景观。防止长江的侵蚀，修筑沿江大堤也是当地人民又一重大负担。经过数代人的努力，才得以安居定业。由于该区光照时间充足，十分有利于鱼类及其他水生生物的生长繁殖，水产资源极其丰富。所以开始时是渔业在两湖地区占十分重要地位，以后河湖淤废，粮食种植业成为主要产业。明代开始，“湖广熟，天下足”之谚，即其现实反映。清代两湖地区成为全国粮食生产基地，为当时社会提供了大量粮食。然而围湖造田后，因蓄水失所引起的洪灾，因修堤经费引起的公私矛盾，以及土客之间产业之争，这五百年来，两湖地区人地关系处于错综复杂、相互纠缠的种种矛盾之中。《明清两湖平原的环境变迁与社会应对》一书，围绕着这五百年来两湖平原人民为生存而斗争的历史进程，揭示了人地关系的复杂性，给我们今后该地区的发展规划，提供一定的启示。

云贵高原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地理单元。就自然地理而言，云贵高原不是

简单的统一高原地貌,而是山地、低丘、宽谷、浅盆相间,河流、湖泊密布,呈现极为复杂多样的地理景观;就人文地理而言,汉唐以来,是多种族别所谓“西南夷”的少数民族所居地。唐宋时期还建成过独立的南诏、大理国。元代以后直属中原王朝,于是大量移民开始进入。明初洪、永年间,为开展军事戍边和屯田,对云贵高原进行大量移民,粗略统计,约有三四百万人口,最终成为我国民族最多的地区。随着大量和多种民族的移入,对当地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发生重大影响。其中最主要的是土地利用方式的变化。首先,移入的主要是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汉人,无论是军屯还是民(商)屯,农业耕地成为平坝地带最主要和分布最广的土地利用形态。其次,由于中央王朝的势力深入云贵高原,林木的开采,成了云贵高原另一重要产业,原始森林中珍贵木材遭到严重破坏。再次,以铜为主多种金属矿业的开发,成为中原王朝掠夺的主要资源。但是原居于山区、半山区土著居民,仍处于“刀耕火种”、“采集渔猎”落后的经济状态。生产的不平衡、生态的多样性,是明代云贵高原土地利用的显著特点。进入清代,康、雍年间“改土归流”后,汉民又一次大量进入,垦殖进入山区,大大推动了山区的农业开发,采矿业也进一步兴盛,林木业给当地不少人带来丰厚收入,晚清以来鸦片种植又成为云贵地区另一产业。总之,在这三百年内,云贵高原土地利用方式有过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在当地资源、自然和生态系统中有明显的反应。对这种变化背后自然和人文驱动因素的探讨,是我们今天认识云贵高原生态环境的现状的钥匙。《云贵高原的土地利用与生态变迁(1659—1912)》在对这种变化进行了深入研究后,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新疆塔里木盆地是世界上最干旱的地区,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流动沙漠区,生态环境十分脆弱。但是它在历史上是丝绸之路南道的必经之地,人类活动十分活跃。但在清代以前,在不少绿洲地区,众多古代人类聚落被废弃,民国时期这里又废弃了大量耕地,而清一代这里的绿洲却基本稳定,这就为我们研究沙漠绿洲生态环境的变迁,找到了一个十分典型的地区。以往的研究认为塔里木盆地南缘绿洲的废弃主导因素是水资源短缺。但是《清代至民国时期农业开发对塔里木河流域生态环境的影响》一书的作者,通过民国时期大量的社会生产、生活以及耕地废弃的历史档案资料进行系统的过程式分析研究,基本复原了这一时期该地区耕地大面积撂荒的社会与环境诱因之间的相互耦合关系。作者认为人口快速增长,垦荒扩耕加速,自然生态资源失衡,是造成绿洲耕地大面积撂荒的根本原因。作者提出了“绿洲废弃规律”,认为“绿洲的废

弃与农业开发强度成正相关”，“耕地的大面积撂荒和废弃与人口压力成正相关”。这种人地的耦合关系的认识，可以为我们今后治理沙漠绿洲地区提供重要的启示。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也是一个地域广大、人口众多的大国。地理环境十分复杂，地球上的各种的地貌，都可以在中国找到它的类型。因此地域之间的极大差异，是中国地理环境的重要特色。要治理好这样一个国家，对国情、地情没有深刻的了解，就不可制定出科学的政策，否则不仅会遇到种种困难，还可能出现适得其反的结果。本丛书的编写，就想解剖几个典型地区，以求从中能得到一点启示。虽然上述五个地区还难以覆盖全国，但有其一定的代表性，则是可以肯定的。

虽然各书的作者，都曾经对这一地区经过较长期的研究，均出版过一定水平的学术论著。但学术无止境。今天各书的问世，仍然可能存在不全面、不细致、不深入的地方，有的结论未必能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同。因此，我们诚恳地希望得到读者的批评，同时也希望这种研究，能够引起大家的关注，期盼有兴趣的同行也能加入这个研究的行列。将我国各地的历史地情搞清楚，让我国的学者和广大民众对我国的国情有一个全面、深入的了解。同时也希望当政者在制定今后发展的规划、政策中，能从中取得一些借鉴。

邹逸麟

2008年6月

目 录

总序	1
绪论	1
第一章 十年倒有九年荒	
——明至民国时期皖北灾害	10
一 明至民国时期皖北灾害概览	10
1. “此地多荒少熟”——明代皖北水旱灾害	10
2. 清代皖北地区洪涝灾害初步研究——以 1736—1911 年间 档案记载为主要依据	19
3. 明至民国时期皖北蝗灾	39
4. 灾害个案透视——道光二十一年黄泛与皖北水灾	54
二 灾害原因探析——兼论淮河流域生态环境的脆弱性	63
1. 水旱灾害原因探析	64
2. 淮河流域生态环境脆弱性泛论	75
第二章 灾害环境与国家应对	
——以明朝荒政事业为对象	80
一 明时期的国家荒政事业	80
1. 蠲免	80
2. 折色	92
3. 赈济	106
二 国家与社会——明朝荒政物资来源	134
1. 国家财政	134
2. 有备无患——皖北预备仓储	139

3. 劝分与捐输——明时期国家劝分政策与民间赈恤	158
第三章 “凤阳之民，未有不穷且苦者也” ——灾荒环境下皖北之民生	176
一 皖北民生贫苦概端	176
1. 近五百年来皖北民生贫苦之大端	176
2. “他处人所不能忍者独能忍”的“饥寒困苦”生活之一般 描述	178
3. 天灾、人祸——皖北民生贫苦之原因	188
二 皖北穷苦民生的调查分析——以民国时期为例	197
1. 近代以前凤台县民生状况——以嘉庆李兆洛的描述为 对象	197
2. 民国时期社会调查所反映的皖北之民生	201
第四章 从“逃荒”到“趁荒” ——灾荒与皖北流民	222
一 从“逃荒”到“备荒”	223
1. 灾荒·饥民·流民——灾害环境下皖北灾民的趁食与 逃荒	223
2. 从逃荒到备荒——皖北“趁荒”	229
3. “流民何处是乐土”——流民的区域流向	236
4. 流民控制——“截留而养贍之”、“驱遣”、“官印护照”	240
二 从行乞到卖艺——皖北流民生存的手段	246
1. 行乞与施暴	247
2. “獼猴撮把戏”	250
3. “身背花鼓走四方”——凤阳花鼓	254
第五章 灾害环境下的社会风习	286
一 重农与安愚、皆窳之习	287
1. 皖北重农之习的一般罗列	287
2. 皖北尚气安愚之风	293
3. 庐、凤以北民皆皆窳	300
二 博饮、健讼之风	312

1. 江北俗好赌	312
2. 皖北以健讼为武	318
三 厌文好武与勇于私斗——皖北尚武、好斗风习	338
1. 皖北尚武与好斗之风的演变及其一般概况	338
2. 文事与武功	353
3. 控制与利用	367
第六章 狼烟四起	
——皖北匪患与社会动荡	374
一 明至民国时期皖北匪患扫描	375
1. 明时期皖北匪盗概陈	375
2. 清时期皖北匪盗略述	381
3. 民国时期皖北匪盗条缕	388
4. “匪盗”案个别透视——光绪二十四年涡阳刘疙瘩等灾民 举事	391
5. 皖北匪盗特征的一般归纳	399
二 明清时期乡村控制与匪盗	408
1. 纷杂的皖北事务	409
2. 乡村日常控制	416
3. 不足与应对	450
结语	466

图表目录

图 1 皖北地区行政区划示意图	7
图 2 1736—1911 年皖北水灾等级时间分布序列	30
图 3 1736—1911 年阜阳、蚌埠洪涝等级时间分布序列	30
图 4 1736—1911 年太湖流域、淮河上游河南地区洪涝时序情况	32
图 5 1736—1911 年皖北洪涝灾害州县范围不同情况年次分布	33
图 6 1736—1755 年间皖北各州县年均洪涝灾害日数	35
图 7 1736—1911 年皖北历年遭受洪涝灾害州县数	36
图 8 明至民国时期皖北每 20 年蝗灾频次	40

图 9	明至民国时期皖北历年发生蝗灾州县分布范围	44
图 10	明时期皖北地区灾荒年份与赈粮年度之比示意图	112
图 11	明时期各阶段皖北地区赈粮数额示意图	115
图 12	1738—1911 年洪泽湖最高水位(志桩水位)变化示意图	469
图 13	明时期皖北地区荒政效果评价相关指标示意图	477

表 1	中国七大江河受洪水威胁地区主要社会经济指标	4
表 1-1	明时期皖北水、旱灾害年序分布情况	12
表 1-2	明时期皖北连续 3 年以上水灾年份	14
表 1-3	明时期皖北连续 3 年以上旱灾年份	15
表 1-4	明时期皖北水、旱灾年内发生时间情况	16
表 1-5	明时期皖北水、旱灾害州县分布年次情况	17
表 1-6	洪涝灾害等级划分依据及文献描述举例	27
表 1-7	1736—1911 年皖北历年洪涝灾害等级	28
表 1-8	1736—1760 年间皖北洪涝灾害年内发生时间统计	34
表 1-9	1736—1911 年皖北各州县洪涝灾害年次及其等级分布 情况	37
表 1-10	1736—1911 年皖北洪涝灾害等级年次分配及其所占比例	38
表 1-11	明至民国时期皖北蝗灾集中发生时期和连续发生年数统计	41
表 1-12	明至民国时期皖北蝗灾年内发生时间(月份或季节)情况	42
表 1-13	明至民国时期皖北蝗灾年内发生月份情况	43
表 1-14	1933 年皖北部分州县蝗灾具体发生范围概况	44
表 1-15	明至民国时期皖北连续发生旱、蝗灾害年份和州县比较	47
表 1-16	明至民国时期皖北部分年份水、蝗灾害俱发州县范围 情况	50
表 1-17	泗州、盱眙县河湖滩地亩数及其生长植物的种类	52

表 1-18	淮河流域主要站点年降水最大量与最小量之比	66
表 1-19	淮河流域各地年均降水日数比较	67
表 1-20	淮河流域各地年均降雨量比较	67
表 1-21	淮河干流上、中、下游比降情况	69
表 1-22	淮河干流南北支流状况对比	71
表 2-1	明时期灾伤应蠲免税粮成数	81
表 2-2	明成化以降皖北地区蠲除之起运、存留、逋欠情况比较	86
表 2-3	明时期皖北地区因灾折色年次	95
表 2-4	明时期皖北改折价格情况	100
表 2-5	明时期皖北灾后有偿、无偿赈济频次(年次)情况	111
表 2-6	明时期皖北地区灾后赈济钱粮数额情况	113
表 2-7	明时期皖北部分州县预备仓设置、演变概况	141
表 2-8	明时期皖北地区社会赈恤情况	169
表 2-9	明时期皖北地区社会赈恤力度情况	170
表 3-1	皖北 5 县农户分类平均比例情况	203
表 3-2	宿县各类农户百分比的变动(1905—1924 年)	204
表 3-3	1922 年宿县户均田亩占有情况	205
表 3-4	宿县户均田亩数变动情况(1905—1924 年)	205
表 3-5	凤台、亳县农村人口、耕地分配及其与全省 12 普查县情况 比较	206
表 3-6	1922 年宿县户均田亩分布及粮食收入情况	209
表 3-7	怀远和宿县(1922—1925 年)平均每家消费数量(元)、 各种消费%统计	211
表 3-8	皖北地区(怀远和宿县)、美国农家年均消费比较	214
表 3-9	民国时期皖北部分县份农户消费项目、支出数额(元) 及其在总消费额中所占的比例(%)	215
表 3-10	民国时期皖北部分地区恩格尔系数及其反映的民生类型	217
表 3-11	怀远、宿县 1922—1925 年各类农户食物消费及其以外 消费品消费比例	217

表 4-1	明时期皖北灾害、荒政及其效果情况	224
表 5-1	历史时期皖北各州县尚农习俗变迁简况	287
表 5-2	1922—1924 年怀远、宿县农业劳作的季节差(以人工钟点 最多的半月为 100)	304
表 5-3	明代南直隶各府州讼风区域分布情况	319
表 5-4	明清时期皖北各州县讼风出现时间情况	329
表 5-5	明清时期皖北部分州县科举(文举)进士、举人情况	355
表 5-6	清代安徽各府州人口、学额、进士、举人数及其位次比较	357
表 5-7	清时期安徽各州府百万人口举士数额情况	359
表 5-8	明清时期皖北部分州县武科举子情况	363
表 5-9	清代安徽各府州武学额、武进士和武举人数目位次比较	366
表 5-10	清时期颍上县武秩人员籍属情况统计	372
表 6-1	光绪二十四年皖北物价	393
表 6-2	明至民国时期皖北匪盗活动年内时间分布情况	404
表 6-3	明清时期皖北各州县人口、事务繁简及其职官设置情况	413
表 6-4	明时期南直隶 18 府州事务繁简情状	414
表 6-5	清时期凤阳、颍上二县县府设员数及官职情况	422
表 6-6	明时期皖北各地巡检司设置、变更情况	442
表 6-7	清代皖北部分州县汛地绿营兵驻防情况	446
表 1	明时期皖北地区荒政效果评价相关指标	476
主要参考文献		483
后 记		494

绪 论

一 问题的提出

环境与人类生存、社会发展息息相关。广义的环境是一个由自然环境、人工环境(如村落、农田、水利设施)与社会经济环境(如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状况、社会体制、风俗)等共同构成的有机整体。在这个复合生态系统内,人工环境和社会经济环境是人类文明的产物,是人类社会的一部分;狭义的环境仅指自然环境,即由资源、气候、水文和土壤等共同组成的自然生态系统。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之间存在着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一方面,自然环境为人类社会提供生存、发展的场所和必要的自然资源,没有适宜的环境场所及自然资源作为依托,人类社会就不可能存在。自然环境的变迁又深深地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人类社会的每一个前进步伐都留有明显的环境印迹,自然环境负向变迁的最终表现形式——灾害——不仅掣肘着人类社会的进步,甚者还能导致某些人类文明形态走向覆亡。另一方面,人类社会在自然环境作用面前又不完全是被动的,人类从诞生之日起,在适应自然环境及其变迁的同时,始终以特有的活动方式应对和反作用于自然环境,不断地影响和改变着自然环境,以致环境总是处于多向的变化之中;由人类活动引起的自然环境的负向变迁也深刻影响着人类自身的生存状况和文明走向。

自然环境的变迁,从形式上看,既有缓慢渐进式的,也有激进灾变式的,但最终结果的表现形式多为灾害的发生,而且灾害事件除给人类带来灾难外,还直接作用于自然环境,从而使既已变迁的自然环境愈加恶化。因此,有学者把“那些不利于人类生存,并对人类生产、生活形成严重危害”的自然灾害也视作自然环境的一部分^①,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① 黄春长:《环境变迁》,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同时也是一个水旱蝗诸灾频发、多灾多难的国度。傅筑夫等曾指出:“灾荒、饥馑是毁灭人口的一种强大力量,而在科学不发达和抗灾能力不大的古代,灾荒的破坏力更是格外强烈。不幸的是一部二十四史,几无异一部灾荒史。水、旱、虫、蝗等自然灾害频频发生,历代史书中关于灾荒的记载自然就连篇累牍。”^①近几百年来,中国灾害频仍,1876—1879年的华北大旱灾、1910年的淮河流域大水灾、1931年的江淮流域特大水灾、1934年的全国大旱灾和1938—1947年的黄泛等等,无一不在中国历史画卷上涂抹了一笔笔凝重而悲哀的墨痕。灾害深深地影响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极大地制约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面对灾害及其引发的饥荒,历代政府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采取了诸多应对措施,社会民间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因此而多有变化。

历史学研究的主题和内容是广泛、丰富的。研究历史灾害及其对人类的影响,以及国家和社会对灾害环境的适应和应对行为,是历史研究应有的题中之义。通过研究,既有利于我们更为全面地透视中国历史和传统社会,也有助于我们清晰地认识和掌握历史环境变迁情况,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

二 以淮河流域中游皖北地区灾害环境为研究对象的原因

淮河是一条古老的河流,与长江、黄河、济水并称“四渎”。淮河在地理学上具有极其特殊的意义,是中国自然、人文地理的重要分界线,其南北地区在气候、水文和植被,以及经济、社会习俗等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别。淮河流域因处于南北气候过渡带、中纬度过渡带和海陆相过渡带叠加地区,加之以历史时期黄河对淮河的影响作用,使得淮河流域成为中国境内典型的环境脆弱带,同时也是人地关系最为密切的地区之一。具体地说,把淮河流域近500年来的灾害环境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出于以下考虑:

第一,从淮河流域环境变迁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看,近500年是其环境变化最为显著的阶段,这种变化在性质上是负向的、消极的,典型表现事象就是

^① 傅筑夫等:《中国经济史资料·秦汉三国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96页。

灾害频发;受多发灾害的影响,社会、经济逆向变迁。唐宋时期,淮河流域还在当时几大经济区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是国家财富的仰给之源。唐人曾称“今国家内王畿,外诸夏,水陆绵地,四面而远。而输明该之大贵(一作费),根本实在于江淮矣”。北宋时的李觏也说“天下无江淮不能以足用”^①。然而,由于黄河南泛及其引发的灾害、战争等自然和人为因素的破坏作用,宋元以降,特别是明清时期以来,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较,淮河流域社会经济发展明显滞慢,落后于其他地区尤其是长江中下游地区,流域“民生凋敝,经济落后,以迄今日”^②。

同流域社会经济发展轨迹一样,淮河中游的皖北地区之社会经济发展也经历了一个大的转变。在南宋初年黄河夺淮之前,皖北一带农业生产条件一直都十分优越。据郑肇经《中国水利史》,从上古到秦汉时期的两千余年间,“淮河安流,无足述者”;魏晋至隋唐,其间无水患而有陂塘之利;北宋时,“淮水虽有涨溢,不为大患,而交通之利特著”^③。社会经济繁荣,是皖北社会发展鼎盛时期。曾知颖州的文人欧阳修有不少诗篇对当时皖北的富饶太平景象进行了描述。其《忆焦陂》曰:

焦陂荷花照水光,未到十里闻花香。焦陂八月新酒熟,秋水鱼肥鲙如玉。清河两岸柳鸣蝉,直到焦陂不下船。笑问渔翁酒家保,金龟可解不须钱。明日君恩许归去,白头酣咏太平年。

又如《戏书示黎教授》云:

古郡谁云毫陋邦,我来仍值岁丰穰。鸟衔枣实园林熟,蜂采桧花村落香。世治人方安垄亩,兴阑吾欲及耕桑。若无颖水肥鱼蟹,终老仙乡作醉乡^④。

皖北民间因此有了“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之说。然而此后,对于皖北民众来说,唐宋时期的鱼肥果香就像一段温馨难忘的“蜜月”之旅,在倾其所有地度

① 罗让:《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策》,载《文苑英华》卷四八九《体用》;《盱江集》卷二八《书·寄上富枢密书》。

② 李长傅:《淮域形势与中国历史》,载《求是》创刊号,1944年。

③ 郑肇经:《中国水利史》,商务印书馆1993年影印版,第133—134页。

④ 《文忠集》卷九《居士集九》、卷十四《居士集十四》。

过和“幸福”亲密接触的日子后,随之而来的则是艰难痛苦的岁月。南宋尤其是明清以来,皖北一由其前的“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之域而变成了提起就心酸的“十年倒有九年荒”的地区。备受灾荒洗礼的皖北地区,社会萧条,民生艰窘,成为孳生流民、匪患的“问题”地区。

第二,从现实看,淮河流域的农业生产在全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流域土地面积虽仅占全国的 1/36,但其人口和耕地却占全国的 1/8;粮食产量占全国的 1/6,在全国七大江河流域中,仅次于长江流域;棉花产量占全国的 1/4 以上,大豆、油菜和花生等油料作物均占全国总产量的 1/5 以上,商品粮占全国的 1/5 左右^①。然而,淮河流域至今仍是水旱灾害尤其是水灾多发区,在七大江河流域中,淮河受洪涝灾害威胁的耕地面积和人口数量,均高于其他流域(见表 1)。受灾害多发的影响,流域农业经济的发展又具有极不稳定的显著特征,这种不稳定的农业状况对全国农业生产具有极大的影响。据统计,1988 年,全国粮食减产总共 89 亿公斤,其中淮域占减产总量的 47%,为 42 亿公斤;1991 年,全国粮食减产 111 亿公斤,淮域减产 76 亿公斤,占减产总量的 68%;1994 年,全国粮食合计减产 119 亿公斤,而当年淮域减产 55.8 亿公斤,占减产总量的 47%。有人据此统计而指出:全国最近十几年内出现的粮食严重减产年份,因淮河流域严重减产而直接导致的占 60%以上^②。

表 1 中国七大江河受洪水威胁地区主要社会经济指标(据 1987 年统计资料)

	黄河	淮河	长江	珠江	松花江	辽河	海滦河	合计
流域面积(万 km ²)	75.2	27	180	45.4	55.7	29.9	31.8	445
耕地(万亩)	10 902	15 184	8 914	1 771	3 943	1 722	11 582	54 018
人口(万人)	7 993	10 449	9 682	2 189	1 239	1 513	8 008	41 073

资料来源:陈远生等《淮河流域洪涝灾害与对策》,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27 页。

第三,从学术界的研究状况看,截至目前为止,虽然学术界在淮河流域灾

① 参见袁国林《治淮与水环境管理》,载《科技导报》1993 年第 7 期;向茂森:《略论淮河在我国中的地位及治理问题》,载《科技对社会的影响》1996 年第 2 期。

② 《略论淮河在我国中的地位及治理问题》。

害环境研究方面业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与学界对以黄河、长江等江河流域为中心的华北、江南和华南等地区的研究力度和取得的成果相比,学术界对淮河流域灾害环境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仍相对十分薄弱。不过,从研究趋势看,历史时期淮河流域的相关问题已引起学界的重视,不少研究者将其中的某些问题作为自己的学位论文选题而进行研究,取得了令人称道的成果。

但是,既有的少数关于淮河流域的历史研究成果,在区域分布上也是不平衡的,其中以下游苏北地区灾害及其影响为多,而作为受灾害影响较为严重地区之一的中游地区,就笔者所见,尚未发现研究其灾况及其对社会影响的专门研究著作。人们对皖北地区近 500 年灾害及其影响的认识,主要还是通过“身背花鼓走四方”的凤阳女之“自从出了个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的《凤阳花鼓》唱词等间接方式获得的。这些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自明以来皖北灾害不断、灾民流徙四方“趁荒”的事实,但其具体灾害情形及其对皖北社会的影响到底怎样,以及皖北民间如何应对灾荒和这种应对使皖北社会产生了哪些变化等等,世人并不十分清楚。为解决这些问题,本书选择了近 500 年来的皖北作为区域研究对象。

三 皖北范围的界定

安徽省的地域划分,通常情况下,有两种基本分法:一是按自然区域的划分方法,以其境内的长江和淮河为界,把皖境分为皖南、江淮之间和淮北三大部分。皖北在很多的时候,与皖南相对应,凡是长江以北的地区(即江北)都被视作皖北。但在具体研究中,学界根据研究之需要,其皖北概念则又有所异。如闵宗殿在研究清代之苏浙皖蝗灾时,就把长江以北地区均划为皖北的范畴;而白文刚等文中的“皖北”,则指安徽省长江以北包括淮河两岸的广大地区,涵括清代庐州、凤阳、颍州、六安等府州,称该地区在地貌特征、社会状况、风俗人情方面极其相似,但与皖南地区有明显的差异;而在张研等的研究中,皖北就是淮北^①。

^① 闵宗殿:《清代苏浙皖蝗灾研究》,载《中国农史》2004 年第 2 期;白文刚等:《皖北乡土因素与淮系集团的发展》,载《安徽史学》2004 年第 4 期;另见冀满红《近代皖北乡村社会统治危机与淮军的产生》,载王先明等《乡村社会文化与权力结构的历史变迁》,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张研等:《19 世纪中期中国双重统治格局的演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导言、第 22 页。

另一种方法是经济或行政区划的方法,为经济学研究所常用。如张德生在《安徽经济地理》中,把皖省分为皖北、皖中和皖南等几个经济区,皖北经济地理区包括皖境淮河以北全部区域和淮河以南的淮南、蚌埠两市,霍邱、寿县、定远、凤阳、嘉山 5 县的全部与长丰县的北半部等广袤地区;中国自然资源丛书编撰委员会的做法也大致相似,皖北地区被界定为:位于皖省北部,淮河流域中游,东部、北部与江苏、山东接壤,西与河南毗连,其范围包括宿县、阜阳、蚌埠、淮北、淮南 5(地)市的全部和六安地区的霍邱、寿县及滁县地区的凤阳、嘉山,共 29 个县(市、郊区);王社教关于清代安徽农业研究中,在对皖北地区进行厘定时,除将清代颍州、凤阳、泗州 3 府州的全部当然视作皖北范畴外,又把当时隶属于江苏徐州府的砀山、萧县 2 县也划作皖北的范畴^①。

另有一些研究论著据其研究主题,也对皖北的具体范围予以了相应的界定。如冀和在考察新石器时代皖北早期文化时,就在有关“皖北地区主要指安徽淮河以北地区”认识的基础上,而把“江淮之间北部的淮河南岸地区”也纳入了皖北的范畴^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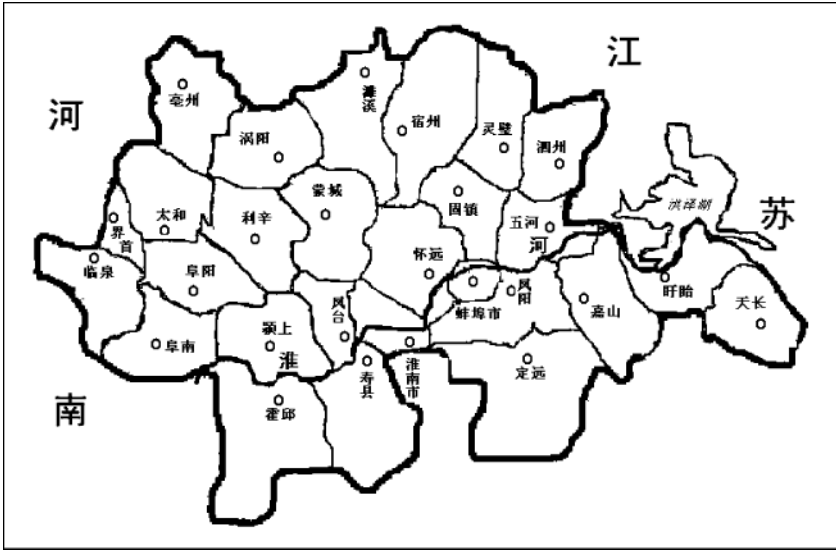


图 1 皖北地区行政区划示意图

① 张德生:《安徽经济地理》,新华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388—389 页;中国自然资源丛书编撰委员会:《中国自然资源丛书·安徽卷》,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93 页;王社教:《清代安徽农业生产的地区差异》,载《中国农史》1999 年第 4 期。

② 冀和:《试论皖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载《中原文物》1997 年第 2 期。